第一章　后全球化过渡期与中国

一、如何解释：当下纷乱的全球格局与再次失衡的世界

1990 年，随着冷战走向终结，美国曾认为和平的世界秩序即将浮出水面。布什总统在布拉格发表宣言：美国将“为所有国家打造一个新世界秩序，它比我们已知的更加稳定、更加安全”。

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呈现出与布什总统的预言截然相反的面貌。军事侵略、政权垮台、种族冲突与恐怖主义层出不穷，令各国政要疲于应对。仅就 2015 年来看，马航客机在乌克兰上空被击落，中日舰船在东海近距离对抗，朝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无不提醒我们大规模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恐怖主义活动更以直接行动宣告了“稳定的世界秩序”只是一个美丽的梦幻：过去的一年中，全球发生的恐怖袭击达 13 500 多起，造成 33 000 人死亡。而且与“9·11”事件时相比，当今恐怖分子的战略思维能力与执行能力明显上升，武器性能不断改良，甚至有专家指出，“核恐怖主义”并非天方夜谭。

在当下这个纷乱的全球格局中，各国利益纽带日益加深，但并没有导致国际社会的稳定；新技术的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前所未有的信息同步，但又催生了空前激烈的价值冲突；“国际秩序”这一概念的使用从未像今天这样广泛，但各国对国际秩序却没有清晰的共识；世界混乱无序，各国之间却又史无前例地相互依存。

什么是全球格局的变化方向？是美国主导世界？是第二次冷

战？还是多极化的世界？透过历史的经验，我们能确定的是，这是一个再次失衡的世界。

这是一个文明冲突的世界。亨廷顿的预言惊人地准确：历史的演变未能产生普世文明，非西方社会乐于接受来自西方的技术，但固守原有的价值观，因此当下主宰全球的是“文明的冲突”。中国温和而坚定地拒绝接受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俄罗斯则对欧美展开强硬反击；至于宗教极端分子，更是营造出了蔓延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文明的冲突投射到当下的全球格局中，凸显出了西方国家维持世界秩序的力不从心。

这是一个经济失衡的世界。在当今的世界，经济被分割成实体和虚拟两大组成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与贸易迅速增长，但全球的资本收益却控制在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手中。这种经济失衡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美国以其无限的货币创造能力俘获了中国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最终导致中国拥有巨额的贸易盈余，但在资本收益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美国拥有巨额的贸易赤字，但享有巨额的资本收益。也正是在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中，全球穷国与富国的收入差距难以弥合。

这是一个大国之间缺乏信任的世界。当下各大国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常态，但大国之间又难以建立高度的政治互信与安全互信。不仅西方大国对中国、俄国始终保持戒备，而且美国与其盟国也时常出现离心离德的迹象。各国之间的合作虽然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无法掩盖其背后的深刻分歧。大国历来是保持全球格局稳定的关键力量，而彼此之间缺乏信任的大国总会给世界带来不安定的信号。

一个再次失衡的世界，意味着全球的治理体制和竞争模式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我们怎么解释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将怎样走向“再平衡”？中国在世界“再平衡”的过程中应发挥什么作用？中国

在“再平衡”后的世界中将处于什么地位？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作深入而全面的战略思考。

二、大国崛起：从工业革命到全球化的世界格局演变

世界秩序之争，主要体现的是大国的竞争。世界秩序就是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尤其是大国权力、利益、观念分配的结果。近代世界第一个崛起的大国是英国。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欧洲列强筚路蓝缕，开辟了新航路，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受益于新航路而经济实力大增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建立了君主立宪政权，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需求的刺激下，以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工业革命在英国蔓延开来。到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从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大生产。

工业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760 年，英国仅占世界工业产值的 1.9%，到 1830 年占 9.5%，1860 年高达 19.9%，英国进入全盛时代，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乃至美国，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世界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各种各样的“西方人的冲击”伴随着殖民扩张扑面而来。1800 年，欧洲人占有或控制了世界上 35%的土地，至 1878 年，已超过 84%。英国更是建立了庞大的殖民统治，覆盖了四分之一个地球，号称“日不落帝国”。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就像黄金一样坚挺可靠。一个以英国为首、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开始形成。

19 世纪 70 年代，以电力发明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随之而来的运输革命（铁路、海洋革命）和通讯革命（电报、无线

电通讯),缩小了世界的空间距离,密切了世界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内战后的美国借第二次工业革命之机迅速发展,形成了欧洲和北美两大世界工业带。垄断组织开始产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以资本输出为主要标志的帝国主义阶段。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国际分工的完成、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体系的出现、殖民体系的建立为主要标志,一个世界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在这个世界格局中,英国依然居于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崛起为经济大国(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值占全世界总量的38%,居世界第一),意大利、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体系中的新兴国家,成了旧体系的挑战力量。

帝国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其占有殖民地的巨大差异,使新老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最终演绎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让欧洲元气大伤,奥匈帝国解体,德国战败,俄国爆发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法国、意大利、英国虽然战胜,但损失惨重。一战结束后,以国际联盟的建立为依托,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为标志,形成了新的全球性国际秩序。

不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它只是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而无法消除帝国主义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重新崛起和德、日、意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泛滥,冲击该秩序的力量和意愿已经磨刀霍霍,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在此时期,英国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具备了世界霸主的实力,却不情愿承担起潜在的新责任,而是伺机攫取世界性利益;社会主义苏联迅速崛起,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快速增长,成为让资本主义世界颇为忌惮的力量。这样,世界形成了德意日集团、英法美集团和社会主义苏联三大势力相抗衡的格局。

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促成世界政治力量的重新

组合。面对共同的敌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联手形成了反法西斯联盟。美国主动承担起了领导职责，在创建联合国和设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都扮演了核心角色，为全新的政治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 。

二战结束后形成了全球性的新世界秩序——雅尔塔体系。这个秩序在政治上所创立的联合国确认了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在经济上所创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代表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愿望和努力。在这个世界秩序中，形成了美苏两个超级主宰，形成了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战后长达四十余年的对峙和冷战。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美国开始进行，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变革，更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冷战时代结束，世界迎来了全球化的高潮。冷战结束后，大国关系中的对抗状态基本消除，大国间的合作和利益上的协调正越来越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大国关系中的主导因素。与此同时，世界生产力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革命性发展，让世界各国着力运用技术、信息和资本的力量去努力争取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最为有利的竞争优势来增强本国的实力，各国经济依存度增高并进而带动政治上的依存，世界经济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开放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重组，跨国公司大量出现并影响世界。全球化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历史洪流。

三、当下大国竞争：由经济竞争到跨国公司竞争到超级项目竞争

国家再大，也总有边界；国家再富裕，其拥有的资源或能力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诉求。因此，人们的利益诉求总会超越国家的边界，而这些在体量上或质地上都存在“差异化”的利益诉求，不仅关系到利益相关者的生存与发达，还可能给相关国家的政治制度、宗教习俗、文化价值带来激烈对撞与冲击。所以，从古到今，国家从来都承担着跨国经济利益关系的协调与仲裁的职能。

然而，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协调与裁决，往往不是遵循所谓“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来处置的，而是相关国家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作出的。那些在地缘政治中“利益攸关”（利益权重大）的大国，往往能够凭借其实力，最终影响、干预区域乃至世界经济政治规则的制定。因此，世界大舞台本质上是大国角力的竞技场。

在古代社会，大国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军事实力的比拼与较量。而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及工业化阶段，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逐步替代古代大国的军事角力，成为大国提升本国经济实力、主导地缘政治话语权的力量来源。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重商主义盛行，国家往往凭借其政治权力掌控、垄断着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国家组织——大型商贸公司。所以，这个时期的商贸公司也承担了大量的政府职能（垄断经营），代表着一定的国家意志（殖民征服）。

不过，伴随着无数小公司的兴起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庞大生产力的冲击，延续千年的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逐步为倡导平等契约精神的自由贸易所替代。在英国，大量生产性中小工业公司取代由国家控制的大型商业贸易公司，成为国家经济舞台上的主角。19 世纪初叶，英国的特许经营被废除，1862 年，英国通过了《公司法》。至此，超越权力、人格乃至亲情的商业合作组织——有限责任公司——取得了法律地位。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

的现代公司，也因此以独立责任主体参与到了世界经济的竞争中。

在市场经济的财富海洋中，一些原本并不起眼的小公司，凭借着专业化生产的成本优势开始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伴随着资本不断聚集、扩张的冲动，至19世纪中叶，在美国、德国，渐次诞生了一个又一个超级企业，如美国的中央铁路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卡内基钢铁公司，德国的西门子公司等等。这些超级企业手握巨大的财力和社会资源的整合能力，所到之处开疆拓土，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变荒漠为闹市，去贫瘠来富饶。个人、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面貌，都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超级企业的扩张中，被深刻地改变了。20世纪初，世界的话语权逐步从英国转移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因为此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超越了英国。

同样，早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超级企业的形成，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逐渐向垄断阶段过渡。超级企业的经济扩张又借助庞大“过剩资本”的跨国流动，向世界各个角落延伸。正是在超级企业的对外资本输出中“跨国公司”应运而生。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不仅具备技术、资源垄断优势的跨国公司通过发达国家间的相互投资，把自己的经济影响力植入到发达国家，而且其资本输出还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到大量欠发达国家，使得传统的垂直分工体系进一步强化。跨国公司因此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已被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所替代。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历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的投资增长势头更为迅猛，1996—2000年平均增幅超过40%，200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流量达到创纪录的1 271亿美元。

随着世界市场的分割日趋饱和，依靠抢占市场份额的传统竞争模式已丧失了用武之地。面对世界经济失衡和文明冲突的后全球化

的到来，未来世界经济竞争的“引爆点”又会是什么呢？是超级项目！即那些产业延伸广、资源整合能力强、体现国家核心战略能力的产品生产。超级项目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和高效率的资源整合，无论哪个国家、哪家公司，只要抓住了超级项目，就能在竞争格局中捷足先登，纵横天下！

四、拥抱全球化：全球主义与企业主义的黄金三十年

全球化是一个切关每个人生活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带来经济上的发展与变化，同时也带来文化、心理以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影响和冲击。随着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朗，全球主义兴起并在全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全球主义是国际关系学中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以人性本善为依据、推崇理性与精神的作用，主张通过道德、法律的规范构建国际秩序、追求和实现人类自由与和平的学说，是一种有别于国家主义的世界整体论。20 世纪全球主义的正宗是威尔逊主义。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打出了“自由”“自决”“民主”的旗帜，勾画了世界和平的蓝图，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原则与模式。威尔逊强调，维护世界和平，求得国际安全，必须制定高于国内法的国际法，必须建立确保国际对话与合作的国际组织。虽然威尔逊的主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宣告失败，但其理论却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实践。二战以后，全球主义开始真正突破主权国家的视界，凸现人类整体的作用，从而赋予全球主义名副其实的全球意义。大量的学者倡导全球主义，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在“民族国家的决策中，对狭隘国家利益的忠诚越来越松弛，而且正在被对全球利益的忠诚取而代之”。

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年是全球主义的黄金时期。随着苏东阵营的瓦解和中国的改革开放，全球史无前例地拥抱着全球化。不仅学术

界热衷于全球主义的探讨，世界政要也对全球主义表示了普遍的赞同。全球主义的思想也渗透到国际社会的重要文献中。如 1992 年人类第一次环境发展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是“怀着在各国、在社会各个关键性阶层和在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层面，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

在全球主义流行的同时，企业主义也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得到追捧，哈耶克的思想被无数人奉为圭臬，自由放任的市场被称为推动经济进步的主要力量。著名的“华盛顿共识”就集中体现了企业主义的核心精神。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一句话，企业主义是全球化时代经济模式的最佳理论。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享受着经济全球化的甜头，全球主义和企业主义在中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13 年 3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俄罗斯时称：“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深刻地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中国的深化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突出市场作用，加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中国的不少企业家一改此前畏惧全球化的态度，主张积极拥抱全球化，要以全球视野和观念去运营商业。走出国门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然选择。企业家们期盼更大的开放。

五、后全球化过渡期：突然到来的变化与不确定的世界秩序

也许很久以后，历史学家还会为后全球化来临的准确日期争论不休。但今天的全球政要和企业家们已经明确地感受到：全球化与企业主义的热潮开始消退，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化轨迹变得难以预测，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在滋生蔓延。

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态度的转变或许可以看作后全球化过渡期来临的标志。

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的流动性过剩不可遏制地发展，但由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进入全球资本市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被一再延迟，人们心中充满着经济持续繁荣的幻想。直到2008年8月，这些幻想彻底破灭了。正是在这一年，不少美国学者认为，2009年上台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将开启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2009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战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后首访日本、印尼和韩国，一反“先欧后亚”的惯例。此后，美国旋风般在各个亚洲国家间穿梭访问，先后参加了东亚峰会、东盟论坛、20国集团的首尔峰会、亚太经合组织横滨峰会，并在纽约召集了美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希拉里说：“毫无疑问，美国已经重返亚洲。但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重返，而且会留下来。”

其实，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从未低于十万人，只是在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美国忙于欧洲和中东事务，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相对下降而已。奥巴马政府的独特之处仅是以前所未有的高调姿态宣称：“We are back!”

2010年，美国与韩国、日本先后进行了亚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同年，希拉里在与日本会谈时，称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也一改往日的中立态度，

高调介入中国南海声索国的争端。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西蒙·泰说："你不必成为一个偏执的阴谋理论家就能够想到，美国正在领着其他亚洲国家对付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返亚太的重心并不在于军事部署，而是各种经济手段。

经济逻辑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大国的战略考量，作为上升大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对此都不陌生。不过，这个后全球化过渡期的特殊之处在于：人类历史上，第二经济大国与第一经济大国在科学技术、军事能力与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差距，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这么大；而它们各自在全球制造业和资本市场中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的中国与美国这么重要。

大国之间不和谐的声音提醒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六、未来预言：来自全球智库、政治家、企业家的观察与思考

早在 1987 年，美国人保罗·肯尼迪就曾经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发展做出过预言，预言世界生产力量的平衡将从苏联、美国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有利于日本和中国的方向倾斜，北京的影响力将超过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建立一个以其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但是不断爆发的危机及地方性冲突却让美国的愿望落空。世界秩序的未来走向愈来愈变得扑朔迷离。世界将向何处去？全球智库、政治家、企业家纷纷发表了对未来世界发展的观察与思考。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中国的强大。世界著名的政治家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

格认为，原有的国际体制正在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的重心将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世界的关键国家主要位于亚洲，或者将来主要是亚洲的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认定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这是新经济现实的结果。美国的《世界政策杂志》2008 年秋季号刊登了一篇文章《中国的崛起》，说：“到 2033 年，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中国可能会毫无疑问地居于首位，美国则位居其次。”高盛预计，到 2027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到 2050 年，将是美国的两倍。

英国《卫报》认为：“中国的转变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 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掌握在欧美手中。”2008 年 5 月，英国智库“欧洲改革中心”的报告也称，世界权力中心东移。到 2020 年，美国、欧洲、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相上下，各自的生产总值将占全球的 20%。

2009 年 9 月，《全球时报》对全球 80 名经济学家就世界格局可能的变化进行了问卷调查。从调查结果看，绝大多数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必将在 20 年左右超过美国，且认为会因此重新塑造世界格局。

2012 年，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在其著作《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的应用下》一书中，分析了从 1870 年到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认为中国现在已经处于取代美国引导全球经济的关键阶段。他预测，2030 年前后，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上的主宰地位将非常类似于 1970 年代的美国和 1870 年代的英国。人民币作为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它来临的时间和速度比想象的要快。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指出：“世界各国还在时刻注意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必然会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宏观局势。”

2014 年 9 月 27 日，西班牙《起义报》刊登《世界新秩序的开端：亚洲中心主义》的文章称："后美国时代的世界新秩序已经诞生，它以亚洲为中心，中国—俄罗斯—印度的三角联盟为基础，建立在中心—周边关系基础上的旧秩序正在让位于各种新的国际关系。"

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说："未来的世界格局取决于中国怎么做"，"美国不可能衰落，但是它的国际地位，相对自己的历史将开始走下坡路。如果中国能不断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平稳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在外交方面采取合适的战略，美国在世界上的独霸地位可能不能维持太久。"

世界正处在全盘重组的过程之中，中国在未来世界的分量越来越重已经成了共识。这对美国构建以其为绝对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愿望构成挑战。

七、秩序重建：增量再平衡机制与后工业文明新范式

基于对当下纷乱全球格局的分析以及全球智库、政治家和企业家们的思考，重建新的世界秩序已然成为最迫切的问题。

那么，如何实现秩序的重建呢？

世界秩序的重建包含了三重要素：其一，新秩序是否具备稳定性，即各国在此秩序中是否能够通过不断调整实现动态性平衡；其二，新秩序是否具备增值性，即各国在此秩序中是否能够获得自我发展的机遇；其三，新秩序是否具备长期性，即各国在此秩序中是否能够获得更长时间的发展期。换言之，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根本之道，各国资源的反复配置、不断重组，归根结底，追求的是综合国力的增值。其他一切工作必须服务和服从于这一中心。那么，重建的世界秩序所呼唤的，其实是一种增量再平衡的新机制。在发展中实现平衡，用可实现自我调节的机制规避风险、应

对危机，从而实现稳定发展。

美国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是基于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理论（walrasian equilibrium），该理论强调市场供求相等，进而强调市场出清。由此，特别强调各国在国际收支中的差额，强调国际贸易中顺差与逆差的失衡。这是在经济学中被严格使用的“均衡”概念更倾向于静态的结果。但经济发展的常态却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因此，这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指的是系统中各个变量经过调整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且当有外力使均衡状态偏离均衡点时，仍有一种内在倾向使经济回复到均衡状态。这是一种稳定均衡。从这个角度看来，没有必要特别关注各国国际收支是否存在正的或负的差额，相反，各国存在差额是一种常态，包括贸易顺差和逆差的失衡等等。真正应当关注的是，这种存在差额的状态是否能够持续。这也是寻求重建秩序的关键视角。在中国文明中，衡指的是在动态中寻求稳定之意。它既包含了英文 balance 所指的平衡，又有寻求机遇、寻求发展的意味，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增量再平衡新机制是未来世界秩序重建的必要条件，而已然揭幕的后工业文明新范式则是新秩序必然到来的充分条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后工业文明时代已然逐渐现出曙光。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提出。他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其中，工业文明时代是生产商品、协调人和机器关系的社会，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同加工过的自然界相竞争，企业主是社会的统治人物。工业文明发展到极致的表征，即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主义和企业主义时代。

后工业文明是机器和企业逐渐让步于知识与科技的时代。正如大量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互联网的高度普及，成为工业文明最美的

晚霞。美国所推崇或宣扬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把公司的力量推到极致。企业力量的扩张已然无法适应越来越激烈的超级项目的竞争。那么，国家的力量、政治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与企业的力量之间的多重整合，则会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也意味着，在后工业文明时代，最核心的力量是理论的力量，最核心的竞争是头脑、理念乃至文明的竞争。为了创新和变革，社会围绕知识实施社会控制和指导，这样也就形成了必须从政治上加以管理的新型社会关系和新型结构。后工业文明的新范式，是社会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从而预先自觉地规划技术变革，减少未来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这种发展方向，是与增量再平衡新机制高度契合的。

那么，存在哪些力量能够使得秩序重建的两大构想成为事实呢？

八、三大力量：当下结构性能力与未来科技能力和新生活方式张力

当前的世界存在着三大力量能够促成未来世界秩序两大构想的实现。即，当下结构性能力、未来科技能力和新生活方式张力。

结构性能力不同于一般性能力。哲学上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一种研究文化和社会的方式。在结构主义看来，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不是某种单一的要素，而是各种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结构性能力是多重要素共同作用下的、对系统或秩序整体带有重大影响的力量。

全球主义和企业主义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历史而言，正是结构性能力缺失的结果。美国所谓的“失衡”，其实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伴生现象。在美国经济处于绝对强势的时期，恰恰是失衡为其带来了巨额红利。但这一秩序的根本问题在于，由于缺乏多边的平衡机制，因此无力实现面临危机之际的再稳定机制。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下的结构性能力逐渐成形。近年来，亚洲在世界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已经达到了60%以上，而中国又占据了其中的60%。亚洲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器乃是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将保持7.1%的经济增速，因此，该地区已然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引擎。中国现有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性能力主要体现在30多年发展积累中在产能、制造等方面的能力。这种能力的输出，必将改变亚洲的经济社会结构，而亚洲经济格局的改变，必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新兴经济体拥有越来越多的能力和越来越强的意愿在未来秩序中占据更大的话语权。新兴经济体和全球主义秩序下的主导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对话、互动和影响，必然成为重建增量再平衡新机制的结构性能力。

与此同时，未来科技能力则是重建秩序过程中的轴心要素。在后工业文明新范式之下，对于科技能力的理解也与工业文明时代截然不同。科技能力不仅仅是企业主义主导下的商品生产能力或技术更新能力。未来科技能力所指的是更广义的科学与技术。它至少具备两层含义。其一，科学是原初意义上的分科之学，即以促进和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为己任的分工合作、协同共进。这里所说的科学首先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文科学，以更有效率地实现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科学。在人文科学的统领下，方能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高度整合。其二，基于更具统筹性的科学分工，社会对技术更好地控制和引导。同时，为实现统筹，也必将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社会管理机制和世界秩序。这种科技能力显然能够实现技术的规划性发展，从而减少不稳定因素、规避风险。

此外，新生活方式的张力则是秩序重建中的推动性力量。新生

活方式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互动的产物，是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碰撞的结果。换言之，在充分利用工业文明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后，在高度网络化、系统化的环境中，能实现更加私人化、个体化的生活。正如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所指出的，互联网为个体提供了成为领导的自由和工具。个体可以决定去做什么、到哪儿去、与谁交往或做生意、是否投选票，甚至可以跨很大距离选择身份或创建新的社区。与此同时，领导的自由和责任始终相伴，个体因此必须在历史长河中前所未有地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个被称为生活家的群体，是科技与文化的整合者及新方式复兴的先导者。个体自由引发多元的文明方式彼此冲撞、彼此融合。现实的经济力量与未来的文明演化力量共同推进新秩序的重建。

九、关键操作：政治力量与公司力量协同的大国竞争

大国竞争的模式永远在变化当中，变化的根源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来都是经济学绕不开的一个主题。由于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文化的性质差异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局势等原因，政府权力与市场契约之间难有一个清晰而不可逾越的划界。更多的情况是，政府需要根据国内国际的形势和需要，相机推出不同的财政、货币、产业、收入分配等政策，以达到纠正市场失灵、稳定经济增长和实现社会公平的目的。

因此，“公共物品”的生产是政府必须要承担的一项“职能”，而国家经济职能的行使又不可能局限于一张界定权限和程序的“权力清单”，还会涉及部门的协调、资源的整合、舆论的引导甚至社会力量的动员。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与社会（民间）的资源动员能力的总和，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

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体现了一个国家的非市场化资源动员能力。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往往能够在关键时期的机会把握或战略抉择上，发挥决定性意义。

公司的力量是公司整合、动员自身和社会资源的能力。从市场方面看，公司力量与其信誉、产品的认可度和财务能力正相关；从非市场因素看，公司力量取决于公司与社会政要、名人大亨、利益集团以及社会大众的联系。上述联系网络伸展越大、关系越紧密，公司的力量也越大。

经济学的理想状况是，政治力量与公司力量应各安其位，即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对于一般的、正常的生活逻辑和社会秩序而言，这种“桥归桥，路归路”的职能分配也是必要的。但是，在超级项目的运作上，往往需要政治力量与公司力量协同努力，才能确保相关生产项目有效实施。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就国内而言，平衡利益关系、利益冲突要依靠政治力量。超级项目产业链长，利益牵涉面广，当事人利益诉求差异大。因而必须启用政府、社会的力量才能协调、平衡各方的利益诉求。公司有能力生产全球的产品，但无法摆平哪怕是最低一级的政府，也没有能力处置一个漫天要价、示范作用极坏的“钉子户”。第二，就国际而言，突破既成的市场垄断格局也必须借助政治力量。如前所述，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公司竞争中，技术、专利、品牌等“国际规则”，环保、安全、文化等“政治考量”，已为现有的跨国公司划出了自己的一块块领地，筑起了一道道的保护墙。华为、三一在美国折戟，小米在印度铩羽，给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公司敲响了警钟：单凭公司一己之力与权力交织的国际垄断势力较量，无疑是蚍蜉撼树。中国公司要走进世界市场，必须利用中国的大国优势，动员一切能够动员的国际、国内力量，在充分释放善意的同时，还必须向企图阻止中国企业进入的阻力“秀肌肉”。

就中国的公司（特别是大型公司）方面而言，则必须充分利用后全球化时代提供的大国实力消长的战略机遇期，锐意进取，肩负起“实业兴国，实干兴邦”的历史使命。选择、实施适合自己的超级项目，则是中国公司突袭国际竞技大舞台的“敲门砖”。

在依托超级项目突袭世界市场的战略视野中，我们仍然要说政府、社会、企业“各安其位”，不过我们还应增加“协同运作”的要求。简言之，我们应该动员政产学的力量来研发超级项目，动员政府、社会力量来解决超级项目实施将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组建恰当的企业，并最终依托公司力量去运营、实施超级项目。

如果说 19 世纪的大国竞争是依靠政治力量，20 世纪的大国竞争已经极大地依赖以公司为代表的经济力量。我们相信，将来的大国竞争只能是政治力量与公司力量的协同。

十、超级项目改变世界：苹果带来的生活方式改变与华为的全球战略

乔布斯的生命哲学是：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难道还有其他原因吗？

正是这个乔布斯参与创建了苹果公司，并领导它成长为世界顶级的科技公司。人生易老天难老，虽然苹果公司的帅印已易主，但乔布斯改变世界的梦想仍在他的继任者心中延续。2015 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毕业典礼演讲中，面对即将走上新的人生征程的学子们，苹果公司的掌门人库克说：改变世界的人可能就是你。

如今，已没有人会怀疑乔布斯对公司核心价值的定位：将强大的科技转化为容易被人们使用的工具，成为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的工具、让世界更美好的工具。这一价值理念用中国的古语来表述就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改变世界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乔布斯相信了，库克相信了；改变世界也是一次次平实行动，苹果公司的每一位员工都相信，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是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也要改善其他人的生活。世界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这就是超级项目的哲学。

由乔布斯、库克先后领导，由苹果公司全体员工来实施的“改变世界”的项目，是当之无愧的超级项目。因为它如此广泛、如此深刻地切入、延伸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中。人们选择了苹果公司的产品，苹果公司的产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1976 年，真正意义的个人电脑 Apple-1 面世，原本只能由专业人员完成的繁杂的数据处理、计算工作，现在普通人也能完成；1998 年，iMac 出生，人们发现个人计算机从未如此美丽；2007 年，iPhone 登陆，移动互联网进入智能时代；2010 年，iPad 发布，上网、视频、阅读、娱乐只需“一本在手”……

其实，苹果并没有改变生活，因为生活是人的内在需要；但苹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因为它的产品能够把人们丰富的内在需要，轻松、便捷地加以实现。

作为世界通讯市场财富的创造者与追逐者，中国华为公司的产品或品牌知名度虽然目前还没有达到苹果公司的水平，但华为是中国企业追逐超级项目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为了追逐项目的目标，华为主要实现了以下全球战略：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1996 年，华为被迫迈开国际化的步伐，起点就是非洲、中东、亚太、独联体以及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十年磨一剑，直至 2006 年前后，华为才陆续登陆欧洲、日本、美国市场。

研发优先，科技为本。作为世界型科技企业，华为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占其公司收入的比重一直保持在两位数，2010 年，华为继续加大了研发投入，年度研发费用达到人民币 300 多亿元，同比增加 24.1%。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正是大力度研发投入，使华

为产品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华为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得到巩固。

入乡随俗，广交朋友。严格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及联合国的法律，直至当地的宗教、习俗、文化是华为国际化战略的显著特征。华为在其所到之处，首要任务就是严格按当地法律规定规范企业的工作。这样的管理理念也构造了华为与西方公司接近乃至于完全相同的一整套制度和流程，这是华为能够在全球市场立足并获得成功的根本要素。

今天的华为，实现了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产品的研发需求来自华为，架构由欧美顶尖专家设计，硬件由华为中国团队完成，软件主要由印度科技人才承担，制造主要由富士康公司完成，最后再在华为的全球市场网络进行销售。

华为成了中国企业迈向超级项目的开拓者！